

七

安东教育惨案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我所知道的“安东事件”始末

王贤涛

“安东报国会”事件的起因

“报国会”的由来

“九·一八”事变后，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所属步兵第一团，驻在凤城县，团长姜全我投降日本侵略者，团副唐聚伍则率一部军队抗日，任抗日军总司令，号召爱国人士起来抗日，东边道一带各县爱国人士，群起响应，并以“报国会”名义，向抗日军捐赠军费。

孙文敷向锦州汇款的原因

在“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政府迁至锦州，成立临时辽宁省政府，和日军还没有侵占的各省、市、县尚有联络。当时的安东县长孙文敷，在日军还没有完全进驻安东县时，曾以“报国会”名义，向锦州临时辽宁省政府汇款25万元奉票。这笔款，是由安东商务会经手，用商业上转帐的方法汇去的。因为“九·一八”后当时的银行汇兑业务停止。孙文敷的意思，是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不能长久，中国不能放弃东北不管，辽宁省政府还有回来的那一天。但是他已任伪职，又不敢明用安东县长的名义。因此，孙文敷委托安东县教育局会长秦某，与安东商务会联络商洽。以“报国会”名义汇款，以表示自己忠于旧主的意思。

安东商务会内添日本顾问

1934年，伪满政权的组织机构改革，增设安东省，安东县成为伪安东省的首县，安东省公署设在安东市内。这时，各个伪机关内，都有日本人参加把持，唯有民间团体的商务会组织内，还没有日本人参加，特别是安东县是柞蚕丝生产集中的场所，各商家也很殷实，商务会也很富足。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榨取掠夺，必须把握各行业的业务情况，首先必须把商务会把握在手中。所以在1935年，日本殖民者通过伪省实业厅长在安东商务会内添设一名日本顾问，参与安东商务会内部事务。同时，还有数名日本人参加到商务会内办公，他们在商务会的帐内查出了汇往锦州的一笔款。查的结果，是安东报国会汇给锦州临时辽宁省政府的。

安东报国会事件的经过

阴谋计划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感到东北人民抗日爱国的思想，无法制止，特别是东边道一带，抗日部队出没无常，使日军受到严重的打击，所谓反满抗日的思想行动，甚为炽烈。日本殖民当局想用镇压的方法，消灭中国人的“反满抗日”思想，但又无词可借。正在这个时候，发现了报国会汇款的事，便阴谋计划假借“报国会”的名义，扩大范围，杀一儆众，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思想。于是他们组织了以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为主体，有伪安东省公署警务厅、伪满军安东地区司令部、伪满军宪兵团参加的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

逮捕

1936年秋，日本安东宪兵队，以“反满抗日”的报国会事件为名，逮捕安东县教育会长秦某，安东林科中学校校长关某，继之，逮捕了已任伪安东省公署教育厅长的孙文敷，安东省公

署教育厅礼教科科长荆可图，并逐渐扩大，凡是伪安东省所属旧东边道各县的教育界人士，大批被逮捕。据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人，在毒刑拷打讯问下，根本说不出“报国会”的具体情况，甚至不知“报国会”是一个什么组织。担任审讯的人，即告诉被审讯的人说：“你只要说出两个人的名字，就不追究你了。”被审讯的人苦于毒刑，只好说出两个自己所熟悉的人名，宪兵队即逮捕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再说出4个人名来。就这样，日本宪兵队先后共逮捕了约三四百人。当时所有东边道一带的教育界人士，被捕的被捕、跑的跑，以致教育一时成了半停止的状态。事情经过约有一年，到1937年春，才结束了这一惨案。

我和甲斐的谈话

在1937年，我以伪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的身份，到伪省管下各县视察村行政，约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回来。我家里告诉我，连续两天有人来电话问王科长在家么？问他是哪里时，没有答复，电话就挂上了。这时，正是以报国会为名大批逮捕人的时候，人心惶惶不安，怕被牵连逮捕；又由于有两次无名电话，语气很不客气，家里感到害怕，嘱咐我打听打听。我到民政厅当行政科长，是由于岩间德也的介绍（岩间，是我父亲王永江当奉天省长时的顾问），他曾嘱托伪安东省公署总务厅总务科长甲斐在政治上关照我。现在，我只有找他去打听。

在我告诉甲斐关于电话的事，是否与报国会事件有关联的时候，他笑了，说：“报国会事件里有你。”我说：“有我，怎么未逮捕我？”他说：“约在半月前，被宪兵队逮捕的人说有你。但是，我知道你以前没到过安东，你和孙文敷他们都不认识，我曾见过宪兵队长和特务机关长，他们已经谅解了，决定没有你的关系，你放心吧。明天我同你到特务机关长那里，谢谢他对你的关照，你不必对别人讲，就当没有这个事就算了。”

我和田中义男的谈话

我同甲斐一块去见日本安东特务机关长田中义男。甲斐说：王贤伟特来谢机关长对他的关照。我当即表示了感谢的意思。田中说：“我听甲斐君说，你是王永江的儿子，王永江是有名的政治家，你将来是有前途的人，我们对于你一定要特别的照看，决不能让你受坏人的牵连，你安心吧，没有问题。”

我和谷口的谈话

过两天后，我同甲斐一块去见日本宪兵队长谷口，谷口说：“特务机关长说你是王永江的儿子，是满洲国有前途的人，不能让你受坏人的牵连。但是你要谨慎，我们还要调查。你知道，满洲国是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建设王道乐土，决不允许有‘反满抗日’的分子存在，报国会是‘反满抗日’的组织，妨碍我们建设王道乐土，不把这些坏人清除，满洲国不能安全，宪兵队负有维持满洲国安全建设王道乐土的责任，所以根据事实，检举了一部分坏人，大部是知识分子，是有思想的，是妨碍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的。若不办，满洲国的建设、安全就谈不到了。既然特务机关长这样说了，我没有什么意见。”甲斐说：“请队长安心，我保证王君决不是那样人。”谷口说：“好。”我又表示了感谢的意思。

轰动全伪满的安东报国会事件，于1937年春结束。1937年2月，孙文敷等10余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经伪满法院分别判处徒刑的约有五六十人。在日本宪兵队内，被刑讯致死的据说也有约50余人。

“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

马腾云 李鹤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遂将我大好河山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我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受尽蹂躏与苦难。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杨靖宇、邓铁梅、苗可秀等，先后在安东（今丹东）地区燃起抗日烽火；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不甘心当亡国奴，以各种形式，向民众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法西斯反动统治，采取高压手段，一方面向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残酷扫荡，一方面大肆逮捕爱国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现根据蒙难的幸存者的回忆及部分档案材料，整理出这一事件的梗概，供历史研究及教育后代的参考。

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波及的地区

“安东教育事件”发生在1936年冬（即民国25年，伪满康德3年）延续到1937年春天。日本侵略者以“肃清东边道^①救国会”为借口，以安东宪兵队为首，从1936年11月12日（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开始，到翌年1月7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安东、凤城、岫岩、宽甸、庄河、桓仁、通化、临江、长白等县，大肆搜捕省、县教育厅（局）长、会长、中、小学

^① 东边道系清末民初的旧行政区划。辖安东、凤城、岫岩、宽甸、庄河、桓仁、通化、临江等沿江各县。

校长、教务主任等及部分商界、财界人士达300余人。当时，安东属省城，被捕者又绝大多数服务于教育界，故人们习惯称之为“安东教育事件”。

事件的起因

“安东教育事件”的起因是比较复杂的。总的来看，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对具有爱国反满抗日思想的教育界、知识界的一次血腥大镇压。其借口是“肃清东边道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爱国志士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等，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并把这个组织逐渐扩展到东北各地。据说，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廷接受北平救国会的指示，1932年返回安东活动。他与当时安东省教育会会长、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陈述了心情，秦积极赞成，并通过工商界以日本函馆地震救灾的名义，为救国会募集资金。1935年12月20日，安东省教育厅举行中学教员鉴定会。在林科中学，秦有德秘密劝导各界以教育界为中心组织分会。听说，除抚松县外，安东省境内先后都组织了分会。由于这个组织是秘密的，筹集资金是通过教育会进行的，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

1936年，救国会事机不密，被汉奸出卖。桓仁有个盖洪洲，他哥哥叫盖维新，曾在张学良的兵工厂工作，乡里有什么难办的事，常常求托于盖洪洲，地方一些豪绅也很器重他。“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退入关内，盖洪洲的身价亦日趋衰落，常受一些绅士的冷遇，盖因而不满，当他得知该县绅士金巨廷和救国会经济上有联系后，就写黑信告密，把信交给宪兵队翻译，要他转给宪兵队长砂本。翻译看了信后，没把信直接交给砂本，却

先给金巨廷看了，想借此勒索。但金看翻译的意图，怕他以此把柄继续要挟，就拒不承认。翻译变了脸，把信交给了砂本，金巨廷等人便被宪兵队捕押起来。经过严刑逼供，金招认了。日本宪兵队便在桓仁搜捕了100多人。其中有个叫李大华，曾任安东县教育局视学，李在严刑下又供出同安东县教育局有联系的人，于是，事件波及到安东。

疯狂的搜捕

1936年11月12日（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夜间，安东县日本宪兵队突然把县教育局长邓士仁的住宅围住，凶神恶煞似地闯入室内，枪口直逼邓的胸口，大肆翻箱倒柜，片纸只字也不肯放过。从凌晨3点多钟搜到近6点钟，一无所获，便把邓绑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安东县教育会长、金汤小学校长张镇藩，安东县教育会副会长、新安街小学校长于学礼，安东县第四小学校长单荣道等。搜捕时，把他们的书籍，连同办公桌抽屉全都拿回宪兵队，带不走的大卷柜贴上封条。当晚捕的还有安东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秦家住的是一座二进院，半夜凌晨1时许，秦家铃响了，秦与妻子去开门。秦妻问：“谁？”外边答的口音不明。当秦妻开门时，秦便乘机藏在大门后边，敌人直奔内院，秦暂逃脱，藏于东坎子一位姓姜的家里（后经友人孔昭鑑又转到英国楼地下室。不久，秦被汉奸秦有君密报宪兵队，后被捕入狱）。敌人没有抓到秦有德，便把秦妻和儿子一起抓去，并搜查了秦在林校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里，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宪兵队、警察署的小汽车横冲直撞，有时敌人将小汽车开到学校院内，指名逮捕；有的趁下班将人带走；有的在路上被截走，并警告家人和同仁不得声张。第一批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还有满商小学校长马仁田、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省林科

中学教务主任李庆善、训育主任侯泽麟、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安东总商会长孙朗轩、图书馆长宋子云、讲研所长孙德润、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等42人。11月15日，日本宪兵队检查了商立小学的书籍，下午逮捕了该校校长刘景芳，接着又开始第二次逮捕。11月16日下午，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坐着小汽车到安东县第二小学，问校长迟学禹：“你是校长吗？”迟说：“凑数。”翻译说：“宪兵队请你去有点事。”就把迟抓走了。当车到了安东省警察厅，就把迟押到一个地下室。日本宪兵冈田拍了拍迟的肩膀，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假惺惺地说：“你的朋友大大的。”迟一看，有各学校的校长、教育局的事务员30多人。12月3日，又继续逮捕了金汤小学教员陈仁轩、朝阳小学教员张仁凤、林科中学教员佟进阶。不久，又逮捕了中央银行安东支行行长淳于喜亮等多人。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各县也大肆搜捕。12月14日夜，岫岩守备队长藤井率部倾巢而出，逮捕了男、女中学校长关英华、赵书纬、教务主任曹甫瀛、训育主任谢忠厚、教员孔昭伦、寇绍准及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内务局长夏渔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商务会长王凤武、财务局长李乃臣等多人。

在宽甸逮捕的有：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小学校长丛树春、职业中学校长吴凤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财务局长栾继先、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商务会长李铭三、万字会长王冠五、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副会长徐静波、马如九、中央银行宽甸支行经理李世瀛、县城街长唐荫阶、职业中学教师李季等人。

凤城县被捕的有：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第一小学校长关子荣、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第三小学校长姜振昌、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第五小学校

长李绍岩、第三小学教务主任赵际清、商务会长白宝山等。

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军逮捕的安东97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合计311人。

严刑逼供与英勇斗争

日本侵略者以“思想犯”、“国事犯”罪名逮捕的这批人，都由宪兵队“突击”提审和严刑逼供。11月17日下午提审刘景芳，问他做过什么事，刘说：“教书，没做过别的事。”这时，敌人就吩咐打手把刘的头、手、脚绑在一个长凳上，用水壶往他鼻子里灌凉水，刘不招认，被打得死去活来。18日上午，又继续对刘施刑，把刘的两手背到身后绑紧吊起来拷打，刘仍不开口。敌人又用一根杠子压在刘的小腿上，开始上去两个人压，后增加到4人、6人、8人。只听“咔嚓”一声，刘痛得昏厥过去。苏醒后，腿断了。在提审迟学禹时，迟不讲，7个日本宪兵就把他吊起来，用铁棍、竹板，从上身打到下身，边打边吼：“你的说话！”直打得迟不能动了，才放下来踢到墙角里，再审问另一人。豺狼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审讯时用尽了各种酷刑，灌凉水、压杠子、用竹尖刺指甲、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全身，有的还把人打得血肉模糊后扔到狼狗圈里喂狼狗，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表现出“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伟大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被捕后，用手指在毯子上划“不知道”给难友们看，积极准备与敌人斗争。11月14日审讯邓士仁时，邓宁死不讲，日本宪兵就用地板刷子把邓的头按到水锅里灌凉水，活活地把邓折磨死了。曹甫藏被捕后，借孩子送饭之机，悄声让孩子转告家属：“一要立志，二要放心。”当曹被拉回原教室让曹上课，敌

人拍照取证时，曹还向学生发出“不当亡国奴”的庄严号召。曾被日本鬼子昼夜审讯，打得遍体鳞伤，终未变节。于瑞庭被审讯时，不但不供认，并怒骂敌人“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敌人活活打死。关英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义愤填胸，他乘敌人不备，抓过案上的刀，直向敌人砍去，当场壮烈成仁……

面对英雄的中华儿女，敌人残暴的手段失灵后，又换了新的花招，妄图软化蒙难者，这一手又被大家识破了。王奉璋被连灌四次凉水，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时，有个翻译便凑到王跟前说：“救国会，日本人也知道不一定有，但这是日本的国策，你若老不承认，把你打个腿断胳膊折，出去是个残废，你不如轻溜溜地承认点，判上几年徒刑出去，还能做点什么。”但王奉璋心里有数，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始终没有上当。敌人第五次审讯林贵家时，日本人没露面，让两个翻译把林领到街上一家商店客房里，桌上摆有香烟、苹果、茶水。林一进去，敌人就以宾客相待，说什么这些日子让林受罪了，并说：“我们看你是个好人，想设法把你救出去。”林问：“你们能用什么法子把我救出去？”翻译说：“你就把救国会里都是谁，你们募捐了多少钱，在哪儿存的，你告诉我们，今晚就放你回家，照常当你的女师校长。”林说：“生死我都不考虑，任凭你们处置。”两个家伙一看达不到目的，又把林押回去。

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为了逼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能干出来。他们给素有德的儿子灌辣椒面时，让90多岁的祖母在一旁看着；还每天毒打秦的8岁女儿，问东问西。8岁的孩子，她能知道什么呢？孩子被打得直哭叫，险些双目失明。90高龄的秦母，在敌人酷刑下，心身受尽了折磨，坚贞不屈。王贡生受刑时，其不懂事的孩子王明鼎不忍看着其父亲备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算了，其父厉声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大义凛然，忠贞不屈，被日本侵略者活活打死。

在日伪严刑逼供下，也有人在敌人写好的供词上划了押，承认拿过教育捐，但不知那是给救国会的。安东总商会的会长孙朗轩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说：“各商号捐的款都是我转给救国会的，下边他们并不知道此事。”他一个人承担了。

奉天陆军军法处的无理宣判

1936年年末的一个阴沉沉的午夜，街上行人绝迹。冰天雪地，全市电灯骤然全部熄灭，日伪宪警，如临大敌，荷枪实弹，晃着刺刀，把安东52名蒙难者，两人绑在一起，押到火车站。蒙住头，装上开往奉天（今沈阳）的闷罐车，到了奉天北站，又被押上汽车，解往奉天陆军监狱。

到了奉天监狱，全给带上脚镣，一个屋里关押3到5人。开始，什么也没问，一天两顿饭。早晨高粱米稀饭，晚上高粱米干饭，半碗菜汤。

6天后，陆军军法处开庭审理。一个日本鬼子，一个翻译。一个一个地提审，主要问参加什么组织，有多少人。有一次，法官在提审宋安东时问道：“你何时加入救国会的？”宋答：“没参加。”法官问：“那你为什么在安东宪兵队承认参加了，还划了押。”宋说：“回法官话，在严刑下不得不承认。就是法官你在严刑下也得承认。”呛得法官什么也说不上来，只得把宋安东押回狱中。在提审迟学禹时，法官问：“救国会谁是头。”迟答：“没参加救国会，不知谁是头。”法官问：“在安东宪兵队怎么说参加了呢？”迟说：“那是打得实在受不了，说的假话。”法官无奈也只得叫迟下去。

尽管日伪什么材料也没有问出来。但是，他们仍是按照他们的既定国策干下去。

阴历腊月二十六日吃晚饭的时候，一看守宣布说：“明天要宣判安东县的了。”单荣道听后，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的，就对看守说：“请您行个方便，给我一点纸，写个信，叫家中来人收尸。”看守给了他十多张纸，他写了信。李勤业也写了家信，给看守一些钱，叫看守把信邮走了。

第二天上午，陆军监狱的院子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军法处一个科长到囚房外大喊：“大家把行李整理好。”不一会儿，叫万寿紫、林云庭、王奉璋等19人出监，押到法庭。法庭是一个大屋子，台上有20多个日本军官，只有一个中国人，王某，系军法处长。他宣布万寿紫等19人判处有期徒刑5年，予以缓刑，当场释放。万等被摘下镣铐，领出法庭，站在监狱院内。接着喊刘景芳、钟树瑞等14人，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3年4个月。第三批是迟学禹、于学礼、侯泽麟、荆百斛等19人，宣布判处15年徒刑。最后一批，军警用枪口对着蒙难者，押到法庭，宣布孙文敷、秦有德、张镇藩等11人为极刑。宣判后，由法警一个个架着难友推上刑车。孙朗轩大骂日本鬼子：“你们末日到啦！”临刑时孙态度镇静，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从容就义。

接着，安东日本宪兵队交给县公署死者名单一份，叫转告各家去奉天领尸，并告诉不准家人哭泣。蒙难者家属闻之，个个泣不成声。他们赶到沈阳大西关姜公祠一看，亲人已面容皆非，血肉模糊，被装在几块烂木板钉的棺材里，上面写着死者姓名。家属欲哭不准，只有含恨啜泣。家属在索取衣物时，件件都是血迹斑斑，不忍一一过目。但是，中华民族是不能被征服的，广大民众是站在死难者一边的。有的过往行人，见死者家属悲痛欲绝，怕日本侵略者再加害于亲属，便把他们扶到僻静之处，劝其早归，免得再出是非。当死难者的棺木过往时，行人无不唉声叹息，对死难者家属投来同情的眼光。

抚顺监狱里的非人折磨

在奉天军法处非法宣判的10到20年徒刑的，很快被转到抚顺监狱，约有80多人。安东县21人。侵略者唯恐这些人再图谋不轨，便都给戴上四五斤以至八九斤的脚镣，而且不分昼夜地让戴在身上。开始关在一个大屋子里，白天都整天坐在木板上，不准歪头斜脑，更不准讲话和看书报。不仅大小便需要报告，就是咳嗽、吐痰，晚间睡觉翻身，也得报告。有时，有人出口粗气，看守便吼道：“你心里想什么，要跑吗？”穷凶极恶，如狼似虎。监内伙食，十分粗劣。一日三餐，全是带霉味的高粱米稀饭，白菜、萝卜不洗干净就下了锅，既不卫生，又吃不饱。1937年春天，监狱里发生了热病，仅“安东教育事件”一案里的难友就死了15人。有的还没断气，敌人就用被子给蒙住，促其死亡，然后把值钱的衣物抢去。监狱里的看守，常常勒索受难者，让向家中要钱给他们使用。有的人家中无钱，无奈就将衣物给看守，以求看管得松一些。

在狱中，蒙难者亦不屈从敌人的淫威。饭食不堪入口，难友们就串通一起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允许家属给送“薄子”（即送吃的），经过斗争，当局不得不答应，这对一些人得以活着出狱，不能不算是原因之一。平时，难友们互相体贴，互相照顾。一年之后，让受难者到工厂里干活，但脚镣仍然不分昼夜戴在腿上，有的就磨破皮、腿肿，肉里出现紫斑，难友们就向家里要些药物和食品，帮助渡过难关。安东县教育局事务员刘长德腿肿了，迟学禹就给他接治，刘景芳就背着他上下工。难友们互爱互助，坚持活下去，要亲眼看看侵略者的末日。

一切反动派都是惯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反革命两手的，日本侵略者也不例外。他们一方面对具有爱国思想的志士采取残酷

的镇压手段，一方面又虚伪的搞“减刑”。第一次是伪满傀儡皇帝访日，减余刑四分之一，以后庆祝日本纪元两千六百年，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成功等，又减了三次，各减余刑的四分之一。这样，大多数是1943年前后出狱的。有的出狱时已气息奄奄，如凤城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出狱后即死亡。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剃发为僧，光复后才还俗。进抚顺监狱时多人，活着出来的只有三四十人了。

光复后的控诉

1945年“八·一五”光复，“九·三”胜利后，安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为怀念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中共安东省委曾在友谊电影院召开千人大会。会上死难者家属及蒙难幸存者，进行了血泪控诉，当场处决了罪恶累累的伪安东省视学官等三名罪犯，为人民和死难者报了仇，雪了恨，并对秦有德等家属，发放抚恤金。1946年在鸭绿江造纸厂又召开类似大会。1948年安东第二次解放后，市公安局处决了27名反革命罪犯，汉奸秦有君等受到了应有的镇压。

“安东教育事件”的殉难者的血没有白流，人民将永远怀念抗日救国的英烈们！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三辑）

教 育 惨 案

——庄河抗日救国会纪实

庄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1936年冬至1937年春，在日本帝国主义白色恐怖下的安东省，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屠杀爱国知识分子事件。受难者除政界、工商界的少数人之外，多为教育界内部曾参加过抗日救国活动的中小学校长、中学教师等。因此，后来的人们都习惯地称之为“安东教育事件”，或谓之“安东教育惨案”、“安东教育救国会”案件。

庄河县当时属安东省管辖，也是“安东教育惨案”波及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本县境内的一些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特别是教育界有声望的爱国人士，在这一案件中，成为当然的罹难者。辽宁省档案馆的敌伪档案，把庄河参与这一事件的抗日组织叫做“北平救国会庄河分会”，庄河本地称之为“庄河抗日救国会”。

庄河抗日救国会的渊源，应追溯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或“辽宁抗日义勇军”的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国土沦亡，故乡亲兄弟被奴役被杀害的凄惨情景，去往北平（北京）的原东北各界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王化一等，在原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支持下，于9月27日成立了东北民众救国会。逃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的青年学生500多

人，蜂拥加入了这个组织。在此期间，庄河县在东北大学和冯庸大学读书的学生郑地令、华春深、李树春等，也随着学校南迁流亡到了北平，参加了“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示威游行，同时参加了向张学良将军和南京政府的请愿活动。后来，在庄河中学读书的吕其恩、吕其惠、吕其善、吕其恕、吕善昌、王玉地、于世英、吴广运、姜悦勋等中学生亦陆续流亡到山东、北平等地读书，探求救国道路。这些远离故乡的流亡学生，在东北民众救国会所组织的“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的爱国活动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为后来的抗日救国思想，首先能在庄河的知识界得以迅速传播，以致庄河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深入到东北故乡开展救亡活动，原东北大学教师车向忱受东北民众救国会的委托，化装成药房先生，原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宋黎和另一个姓李的学生化装成两个徒弟，于1931年底从天津塘沽乘日本“天潮丸”轮船出关，在大连登陆。沿途来到皮口、庄河等地，向知识分子、农民群众和原东北军旧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为在安东省教育界成立抗日救国会或义勇军打下了思想基础，1932年，东北民众救国会又派遣原安东林科学学校校长李献廷返回安东，假装亲日，暗地联络教育界人士，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春，安东省教育界“有力同心者”于安东图书馆秘密集会，成立了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安东林科学学校校长秦有德为会长，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字斗南）为名誉会长。救国会的宗旨是：抗击日寇，收复东北。

据庄河县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林贵家（字省三、曾任伪庄河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在“文化大革命”前遗稿中记载，及

东沟县同案难友迟学禹（东沟县上届人大副主任）老人提供：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名誉会长孙文敷，于康德2年（1935年）12月20日，利用省教育厅长的地位，将出席安东省教育厅举行的中学教师鉴定会议的13名代表，召集到安东林科学校，秘密集会。庄河县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是宋良忱（伪庄河县教育局局长兼两级中学校长）和林贵家。这次会议又进一步完善了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组织。会议还部署安东省所属各县要立即组织起“以县教育局及其教育界人士，农、商会长和其他官民有力者为中心”的抗日救国会。会议期间，孙文敷抓紧时机，趁晚间暗地邀请同他亲近的人，来到他家秘密策划抗日救国的具体事项。宋良忱是被邀请的亲近者之一。历时5天的中学教师鉴定代表会议，实质上变成了策动抗日救国的秘密会议。

宋良忱、林贵家回县之后，马上着手抗日救国会的组织筹备工作。1936年春，宋、林召集以教育界为主的某些人士会议，成立了庄河抗日救国会。会上，大家一致赞同秦有德和孙文敷为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的主要领导人（孙当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曾是杨宇霆、阎锡山、孙传芳的同学，但也一度厌恶杨宇霆等迷于官廷，只顾争权夺利，不顾百姓死活的丑恶行为。他在民国14—17年间任庄河县长时，努力兴办教育。在县内曾得到“廉洁清风两袖”的赞誉。因此，在教育界享有较高威望。

庄河抗日救国会由13人组成。宋良忱任会长，伪庄河县政府内务局长杨维嶠任副会长。下设4个部，每个部由一个部长和1~2名干事组成：

宣传部长：林贵家。下设两名干事是：伪庄河县教育局礼教股股长许三辰（别名许子扬）、伪庄河两级中学训育主任张彦果（别名张季实）。

总务部长：杨维峰兼任。下设1名干事，由伪庄河县教育局科员于心泉（别名于德渊）担任。

组织部长：戚景龙（伪庄河两级中学教务主任）。下设2名干事是：伪大孤山第三小学校长王道权（别名王宪五）、伪庄河职业学校、即庄河农业中学校长孙俊卿（字任秀）。

监察部长：姜雅亭（伪庄河县商务会长、私营“同力和”商号经理）。下设2名干事是：伪庄河县教育会长兼第一小学校长孙孝先（字辑武）、伪庄河县警务科长王俊峰。

另有伪庄河县大孤山第二中学校长徐成章（字锦轩）也是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成员。

庄河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庄、岫、凤一带的抗日斗争活动仍在继续，从日本的正规军到以李寿山为头子的汉奸武装——大同队均遭到抗日义勇军的严厉打击，日伪统治集团的嚣张气焰大大削弱。为了配合抗日义勇军的斗争，狠狠地打击日伪军，庄河抗日救国会一面抓紧发展组织，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庄河抗日救国会，从开始的500多人，发展到700多人，抗日救国会的成员中除少数各界有名望人士之外，其主要对象是中、小学校长，中、小学教员。县教育会的领导，把全县参加教育会的中、小学教师全部转入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并将每人每年缴纳2元钱的教育会费直接转为抗日救国会会费。

康德3年（1936年）4月，庄河抗日救国会召集救国会的主要成员会议，会议是宋良忱、杨维峰主持的。这次会议着重动员募集捐款，议定将一部分捐款支援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一部分捐款支援东边道的抗日义勇军。时隔不久，庄河抗日救国会得知邓铁梅余部欲来庄河的消息，遂布置会员作好迎接准备工作。

接着，庄河抗日救国会又在庄河县教育局召开了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宋良忱。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决定从全县参加教育会的中、小学教师每人每年40~80元的工资补助款里扣留5%，名义是补充教学经费不足，实质上是作为救国会的捐款，共筹集了7000多元；县工商联筹集捐款3000多元；有的救国会会员还额外地捐了一些，如宋良忱个人就捐款300元。总计筹集捐款1.058万元。

1936年6月至8月，原邓铁梅余部的一名营长李子英，以贩卖大烟为名，两次来庄河，经宋良忱、姜亚亭批准领取募捐款3500元。他们有了捐款，后来在北平救国会的支持下，购买了一些枪支弹药，加强了义勇军的武器装备，增强了战斗力。庄河抗日救国会，还通过安东救国分会的关系支援俗称北大林区即杨靖宇所属的抗联部队2500元捐款。

庄河抗日救国会事件的暴露是同安东救国分会遇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总的原因是日本侵略者为了肃清“东边道抗日救国会组织”，镇压抗日义勇军，熄灭反满抗日怒火。

抗日救国会被日本侵略者洗劫的导火索有两种说法：

(1) 据历史资料记载，事件首先是从桓仁县开始破露。1936年9月17日日伪警务机关在侦察中偶然发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杨靖宇的副官李相山派遣到地方的工作队员冷遇春潜入桓仁县城，谋划征收义务费，立即将其逮捕，审讯过程中，潜入本县活动的另外两名工作队员，以及本县绅士吴凤兴、孟继一、孟广心的募捐活动也被发现，遂被逮捕。

(2) 迟学禹等当时被难者提供，“九·一八”事变前，桓仁县有个铁匠，叫盖洪洲，他哥哥盖维新在张学良的兵工厂工作。该县的一些绅士经常通过盖洪洲托其哥哥盖维新帮助解决一些难办的事情。因此，盖洪洲在桓仁县内曾一度受到一些绅士的

推崇。“九·一八”事变后，盖维新随张学良进到关内。这时，倚仗其哥哥的势力，风行一时的盖洪洲失去了直接为故乡绅士们办事的机会，自然落了威并遭到绅士们的冷遇。盖洪洲因此便怀恨在心。当盖洪洲在偶然中得知桓仁县绅士金巨廷等人在抗日救国会的策动下为抗日义勇军提供捐款时，觉得发泄私愤机会已到，立即托人写信，密告金巨廷等参加救国会。金巨廷等就这样被宪兵队捕押起来。接着，以桓仁县教育界为主的救国会成员近百人被捕。这股大逮捕的阴风很快波及到安东省城及其所属各县。

1936年11月中旬，安东省教育厅长、抗日救国会的名誉会长孙文敷、安东省总商会会长孙朗轩、图书馆长宋子云、讲研所长孙德润、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教育局会计王宝璋等多人被捕。在搜捕过程中，宪兵们从安东省教育厅一名姓孙的科员的办公桌里发现了救国会名单，这就成了日本侵略者大规模逮捕的把柄。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就此基本瓦解。

搜捕抗日救国会的风暴很快卷进庄河。1937年元旦，驻扎在庄河城内的日本宪兵队，使出了阴险狡猾的花招逮捕爱国志士。他们首先来到宋良忱家门外，声称请宋良忱参加县政府的元旦宴会。一入宋家院内，凶相立即暴露，遂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将宋良忱逮捕。5天之后（元月7日），日本宪兵队用类似的手段先后把杨维嶠、孙俊卿、姜雅亭、徐成章、林贵家、王道权、戚景龙、张彦果、王俊峰、于心泉、许三辰、孙孝先、刘德武逮捕。其中刘德武当时释放，余者13名全部被押进了庄河县城日本领事馆（现为庄河县幼儿园所在地）。

逮捕风暴过后，整个庄河县城到处是万马齐喑的悲凉景象。人们面面相觑，不敢集结，更不敢议论国事。在一段时间里，两名日本宪兵每天早晨都站在庄河中学的校门口，手持刺刀闪闪

发光的大枪，怒目监视着来校的师生。师生们既不能随意溜出校门，又无法安心上课。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鬼子戴上“国事嫌疑犯”的帽子。一时间，活泼欢快的校园失去了朗朗的读书声，代之而来的，是师生们憎恨和仇视日伪野蛮统治的情绪愈来愈浓。

事隔不久，日系东繁人进入了庄河中学任副校长、教师等职，原校英文教师田肇履任校长。领事馆的特务、日本宪兵天天出入学校翻箱倒柜，搜查书籍。除教科书之外，几乎“非秦籍皆焚之”。嗜书如命的青年学生，含着热泪，把心爱的书投进火中。天后宫（旧庄河中学宿舍院内）前的三个大鼎，通宵达旦，书烟弥漫。年逾古稀的姜悦鹏老人（庄河中学退休语文教师）回忆这段凄惨历史，甚感悲切激动。他说：“我手中保存的一部英汉大辞典，就是在那时候被强令扔进火堆烧掉的。”

1937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初一），被判处极刑的宋良忱、杨维嶧等6名爱国志士，于奉天南门外浑河岸上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杨维嶧临刑前在一个火柴盒上写下一首短诗，转给前去奉天收殓尸体的亲属于鸿祉（字响洲）。诗曰：

生儒死僧证本性，

晨钟暮鼓起斯文。

6位死难者的尸首，有的就地掩埋，有的由家属或亲友设法运回了家乡。杨维嶧的尸体经亲属于鸿祉回旋周折运回了故乡，并遵照他的遗愿，埋在庄河城北老爷庙岭。据其弟杨维嶧回忆，墓碑上镌刻着“东北大学文学士杨维嶧之墓”等字。

侵略者为了笼络人心，玩弄王道乐土的伎俩，对在抚顺监狱服刑的所谓“叛徒”，先后施行了二至三次减刑，历经几次减刑，不少人得到提前出狱。庄河县同去抚顺监狱的，除了张彦

果被折磨死于狱中之外，余者林贵家、戚景龙等，于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前，先后出狱。

（摘自《庄河文史资料》第二辑）

通化教育界惨案亲历记

徐云翔口述 徐 华整理

1936年冬，日本宪兵队把省立第六师范（设在通化县城——今通化市第二中学校）前任校长马骥北从辽阳老家抓回来之后，又把现任校长佟儒也抓了起来。不久，女中校长修禄、原教育股长马清川（字文泉）和农中校长杨培伍都接连被抓起来了，闹得全城教师惶惶不安。

12月20日早饭后，我正在炕上坐着，一个朝鲜翻译领着个日本宪兵来到了我家。翻译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依实回答说：“我叫徐云翔。”翻译对日本宪兵说了句什么，又对我说：“走吧！”他们把我带到日本警察署（今通化市民主路派出所后院），推进门洞的小屋里。进屋一看，里边已抓来了5个人。他们是我们农中校的数学科主任战德成、自然科主任宋栋臣、教务主任王育成（字炎培）、数学教员赵广智和奉天省立师范的向老师。

在这里押了3天，又把我们送到日本宪兵队拘留所。在押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每次审讯大都灌凉水、灌辣椒水，摔、打，严刑逼供，问我们干些什么“反满抗日”的事，有的还拿我们开心。有位女中的体育教员郭毓琴怀了孕，她穿的棉袄鼓得高高的，日本宪兵拍着她的肚子嘲弄地问：“孩子的有？”日本宪兵

见她低下了头，便开心大笑起来。

另一名叫别士儒的教员，60多岁了。一进监狱就把假牙摘下扔了。他是山东人，摘了牙，话语就更不清楚了。日本人问他的时候，翻译张秋水费了很大的劲才听出：“我是月薪20元的代课教员啊！”日本宪兵听明白了他的话后，似乎觉得不屑费力，把他和郭毓琴一起放了。

在宪兵队拘留所一共押了我们26个人。3天之后，就把我们每两个人戴一副手铐，逼上了两辆汽车。我和宋栋臣同戴一副手铐。两辆汽车都用帆布蒙着，只能看见驾驶楼里坐着的日本宪兵。汽车跑了20多分钟，冷丁停下来，宪兵端着枪呜哇叫着让我们下车。俩人戴一副手铐子，上下车很不得劲。下车一看，才知道汽车到了通化北山官道岭北坡。宪兵见我们都愣在地上，又呜哇直叫，“快快的解手！”听说“解手”，这才松了口气，我们赶紧地小便。临上车前发现汽车风板上写着“肃正工作”四个字。

到了山城镇，又把我们推上了火车，电灯亮的时候，我们到了奉天（今沈阳）。走出车站，又逼我们钻进了一辆大客车里。客车窗户用布遮得滴严，外边啥也看不见，汽车跑了20多分钟，才知道到了“奉天陆军监狱”（今沈阳大南关下头）。进了大门，里边是平房。押我们过了一个过堂门又是一趟平房，再过过道门，又是一趟平房。进了第四个过道门，就把准备好的脚镣子挨个给我们砸上了。我请求换一个小一点的脚镣子，看守立即瞪大眼睛说：“你这个8斤镣子还嫌重？邓铁梅戴的是20斤的呢，那是现给打的！（邓铁梅是抗日英雄，一家全被杀害了）。”

来到奉天，已是12月27日，我带的鸭毛褥子，不准带进监狱，刚过第一个过堂门就被扣下了，说是狱里边有铺有盖。进监狱一看，只有两条毯子，让铺一条盖一条。监狱里比外边冷，

早晨起来，板铺缝里全是白霜。我住的监室很小，住4个人，除我之外，有我们农中校的宋栋臣、秦有德（安东林科中学校长）和一个县银行经理。小屋挤得无法仰脸睡，只能侧着身子。因为太冷，晚上谁也不脱衣服。宋栋臣穿件羊皮袄，生了虱子，顺着羊毛直窜。

吃的饭每天都是带皮的苞米糗子，有的人咽不下，就把嚼过的皮吐出来，用纸包着，偷偷扔掉。

转过年，1月29日，军法会审，把我们带到第一栋平房里的法庭上，我们站成一排，我扫一眼，我们通化县的26人全到了。坐在法庭上的法官是中国人，另有翻译官和记录员，他们身后坐着三四个日本人。说是军法会审，实际问得很简单，即叫什么名字，当了多少年校长或是教员，就问这么几句话，问完又押回监室。

以后是单人过堂。问我：“你是美术教员吗？”我说：“是。”日本人问：“你的画画到会？”我说：“学过画画。”日本人递过一个墨盒，一支毛笔和一支铅笔，让我照他画。在我画画的过程中，又把我们农中教员谭尚志叫了进来审问，问的还是那一套。等我画完了，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头头）说了一声“约西”，说完就让我走了。

2月的一天，听看守说，头一批枪毙了5人，其中有一个临上刑场时质问日本人：“你们还能错杀无辜么？”日本宪兵一听不好，忙把他连同其余4人的嘴里都塞了棉花。后来知道，敢于质问的人是通化县原教育股长马清川，另外4人是省立第六师范前任校长马骥北、现任校长佟儒、女中校长修祿和我们农中校长杨培伍。

第二次军法会审时，只剩下21人了。省六师教员里佐华（字汉藻）、修广汉等6人，被判刑13年零4个月。农中数理教

员温成贵、教务主任王育成、数理教员战广智（字德成）、国文教员官宪斌、化学教员谭尚志、教员姜勤、赵殿礼、宋栋臣、××、省六师教务张森、栾兆环、女中国文教员孙耕尧、师中教员郭景华、原教育所所长——通化县志主编李振华（字晓锋）和我，共15人，被判了5年的犹豫刑，监外执行。

2月2日，看守把我们的脚镣子全给砸开了，送到奉天西站的日本宪兵队，把我们的头剃光。日本宪兵队训了话，大意是：必须老老实实地效忠大日本帝国，不准反满抗日，如果再犯，就追加13年零4个月徒刑。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回到了通化。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教育事件”亲历记

李介夫

我原名李世瀛，字杰夫，现名李介夫。1905年生。原籍营口县，现住丹东市，1923年冬，毕业于辽宁省立商科第一高级中学。1925年春，入旧边业银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并入伪满中央银行。1933年转任该行宽甸支行经理。

1936年，日本侵略者在东边道各市县展开一个所谓的思想大讨伐，遍及安东、凤城、宽甸、岫岩、桓仁、庄河、通化等地。首先受害的是教育界人士，嗣后，逐渐殃及其他各界，故习惯称之为“教育事件”。现将我亲历、亲见、亲闻记述如下：宽甸城内日本宪兵队从初秋起即开始捕人。县师中校长、教育会长丛树春（字育深）、职业校长吴凤宸（字定宇）、教师李季、训育主任肖懋彦、女子学校校长邹绍南、三育小学校校长高某都

先后被捕。我是冬11月初，先于家内严行搜检后被捕的。拘留场所是临时改用一家歇业的浴池，室内各床位都用整匹白布包着，被拘留者都被隔离，各不相见。只有在大小便时在厕所里，在看守的监视下有一见的机会。当时，看守人、审问人都是日本人。除在审问时用中国翻译外，其余时间见不到一个中国人。需用的被褥及饭食，都由家里人送去，但只能守候于门外，不能进入室内。

我是在晚5时前后被带入监所的。入所后立即审问，审讯时在座的有县警务局两个指导官、宪兵队小队长及一名日本警察，没有翻译。最先问话的是立山指导官，他用半语子的中国话问我：“为什么逮捕你知道么？”我自然回答说：“不知道。”这3个字一出口，立即触怒了他们。一声怒吼，4个人一齐动手将我捆吊起来。离地虽不高，但在他们4人拳、脚、棒的两面踢打游动之下，我先是哀号，后便昏厥了。豺狼们见我无声无息，才将我放下来，连拖带架，将我拖到床铺上。我喘息片刻后，又被架去审讯，仍然是暴打、昏厥，然后又被拖回扔到床上。约10分钟后，来了个日军医官，略事诊视，即给我注射，是强心剂还是止痛针，我不知道。只觉注射后，减轻一些痛楚，肉体上的伤痛减轻了，而思想上的伤痛却增加了。

第二天早饭后，审讯又开始，指导官不见了，只有宪兵队长、中国翻译和1名宪兵，3人坐堂，仍然是简短的问话，用力暴打，直至昏迷，才架回床上，找来军医注射。

第三天上午仍是昨日3人。这一次却公然说我是反满抗日组织里的重要一员，我当然要极力辩白，这又触怒他们，一个宪兵用一大碗辣椒水来灌我，只灌了一半，我就气息奄奄，呼吸失灵。他们又将我架回。这次医官来后经过一番较细的诊视，才给注射，随后又向宪兵小队长说了几句什么。

在审讯我的同时，对其他被难者同样进行了严刑拷打，吼声、哀号声不断。一次，在厕所里和丛校长相遇，他是故意来找我通消息的。因为这个临时监所，对大小便的时间不加限制，而监视的日本警察，又站在很远的地方。丛就对我说，县红万字会分会长王冠五和他同时被捕，但因胡说、认供，后又翻悔而翻供，遭到几次毒打后，在很冷的一天，宪兵将他衣服剥光，捆在木凳上，放到院内灌辣椒水，活活被折磨死了。尸体抛向何方，谁也不知。你的床位就是原来他住的地方。我当即向他说：“这样看，咱们宁肯被打死，也不能胡说。”他说：“太对了。”这就坚定了我的信心。

审讯突然中止了两三天，但捕人仍在继续。县商务会长李铭三、农会会长吕武臣、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商务会副会长徐静波、马如九、县城街长唐荫阶等也先后被捕入监。

宽甸城内原驻日本宪兵队只有一个军曹小队长，4名宪兵。但是，沉默几天后，忽然在一天的上午，由外地调来五六个宪兵，其中有一名准尉队长、一名曹长、一名军曹及两三名宪兵和日本、中国翻译等多人，在监所里立刻展开大规模的审讯，所有的房间都被用作审讯室。野兽般吼叫，夹杂着被难者哀号，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我被日本翻译带到他们所谓的队长面前。他坐着，让我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用和缓的语气向我说话，由翻译转说：“你们所干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快快地说实话，就叫你快快地回家，你可以说吧。”我哀婉地回答说：“我有什么理由反对满洲国呢？我实在说不出我有什么反满抗日的事情来。”话刚落音，这位队长立刻显出不耐烦的神色，马上命翻译把我送回去。

次日晚7点后，一个宪兵将我带到一个最里间的审讯室里，

有一个着便服的日本人（后来才知他是营口宪兵队曹长大曾根），坐在办公桌的西面，让我坐在东面，开口便用流利的中国话向我说：“你是营口人，我也是营口人，咱们是乡亲，可以来叙谈叙谈。”我回说：“这很好。”开始是山南海北不着边际地谈，从营口的知名人士，谈到沈阳、安东以至全国各地，我对此大多是以闻所未闻，茫然不解的态度来回答他。以后转入正题，给我纸笔，让我写出心里话。我为了消磨时间，缓慢地将我昨天回答那位队长的话，加以润色，写了一篇多。他看过后，不无可否地递给我让再写。我又将在银行里的经历详细写出。他看后，仍命再写。我答以实无可写的东西之后，他也未再催逼，但问话却又开始。断断续续地，有关的，无关的，问个不休。那个宪兵已添了多次炉火，倒上两三次开水，并坐在旁边椅子上打了多次的瞌睡，这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那宪兵有些耐不得，过来将我拽起立在室中央，手里拿块劈柴，恶狠狠地问我：“你说话不？快快地说话。”没等我回答，便用劈柴打来，只两下便将我打倒在地。大曾根起来阻拦，他才住手。由两人将我架回监去。

第二天晚8时后，又经过3个多小时的讯问和答话，仍无结果。大曾根改用恐吓手段。此时，在外间正有一曹长刑审高校长。大曾根将门拉开，陪审宪兵将我带到门边让我看。高校长手脚捆在一起，高吊在房梁上，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而下面的军曹却还是狂吼乱叫，手持长手杖猛打不休，我睹此状，立即昏迷，他们又将我拖架回床，并由军医注射。

第三天又问了很长时间，我最后哀求说：“队长啊！豆子里有油，经过挤压，它就出油；石头里没油，你把它压得再碎，也压不出半滴油。”他听了，立刻冷冷地说出一句我听不懂的日本话来，并挥手令宪兵将我送回床位。

过两天，又由那个专门能用重刑打人的曹长，把我带去审问。我以为是要来硬的，但是进门后却向我说了较长一段话，翻译翻给我说：“我们的政策，是一种讨伐政策，全世界都这样做，你怎么样？快说实话吧！”我回答说：“我说过的都是实话，再要我说，只能再重复一遍。”

就在这一天，他们用诱惑手段，从吴凤宸校长身上打开了缺口。经过较长时间的问话后，在吴回来时，已无脚镣声。而送他的翻译，边走边和吴交谈。我从布帐缝里见到吴脚上已无脚镣。

缺口一打开，暂时听不到审讯室里兽吼和人号，但对其他被难者的审讯，仍在不断进行。

在12月末的一天，我被带到审讯室。这次在座的除大增根曹长和一个外来的警佐及一名翻译外，还有县立山指导官，丛、吴两位校长也在内。我一进门，大曾根就用日本话问我，“他们都承认了，你怎么样？”我说：“他承认是他的事，我和他们毫不相干。”立山插口说：“你们的事，我们通通明白，你要快快说。”他见我还不开口，就加重语调说：“我们的法律，只要有6个人作证，你就是不承认，也同样可以判罪。”我苦笑一声说：“用大日本宪兵队长的身份，在满洲国不要说找6个人，就是找60、600也是极容易的事。”立山先插口骂我一声“八卡”，大曾根厉声说了一句日本话，翻译也同样叱责我说：“滚回去听着吧！”从此，再没问我。

1937年1月10日早晨，通知所有的被难者家属说，即将把我们送往沈阳，让家属给准备少许随身使用的钱物。约在8点左右，开来了一辆大客车。在上车之前，立山指导官向我们说：“你们这里到现在没有说实话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局长，一个是李经理，杨只说了一半，李一点也没有。到沈阳要通通说

出，快快回家，不然，脑袋的没有。”他说完就由宪兵曹长和宪兵们把我们带到车上送往安东。同行的有丛树春、吴凤宸、杨春华、邹绍南、吕武臣、唐荫阶、高校长、肖、李二教师和我共11人。抵安后，肖、李又被送回，另将李铭三送来，原在安东审讯的金文彬县长、栾继先财务局长也一起送往沈阳，计12人。

当晚在安东宪兵队的拘留所里，始与栾继先相遇，金县长另在他处羁押。拘留所内只有板地，无炕、无床。听到栾的转述，才知道去年末，已由安东送沈52人，凤城11人。他在安东遭到的刑罚，比在宽甸的人为重，全身扒光，灌凉水，满身浇水，然后用铁刷狠狠刷去冻结的薄冰。每次回拘留所，都是拖回来，有一次是倒拖回来，脑后拖去了头皮，伤痕犹在。极刑惨目，实不忍睹。

晚8时左右，忽有一朝鲜翻译拉开窗口给丛、吴二人送袜子，他们是他们二人的学生。我们下车时，见他含泪向丛、吴二人说：“你们都来了。”说完，便背过身去。在送袜子时他急促地说：“你们明天送沈阳，到沈阳的都不轻呀，你们快翻供。”说完关上窗口快步走开。这时，室内堵人，鞫商如何翻供，只有吴校长俄在一个角落里不言语。

次晨7时，将我们12人用汽车送到火车站，由军曹和宪兵们押送到沈阳。下车后，即由专门押解犯人的囚车，将我们载到陆军监狱。经过一整套入狱手续：点名、搜身、抽裤带、登记、钉镣后，这才收监入狱。

狱室是两栋，一栋大、一栋较小，我们有8个人被投入较小的一栋里，室内两面对立10个小屋，中间有约2米宽走廊。进门西间是看守室，东间是小库房，我们所有被收的衣物，都放在这里。这8个人是：金文彬、丛树春、栾继先、吴凤宸、杨春

华、李铭三、邹绍南和我，分监在1—8号监室内。

监门只有一米高，必须深深躬腰，才能进出。入门后，见室内有3人盘膝坐在不满半尺高的板炕上，靠边有一人合衣蒙被躺着。3人见我进屋，自动地从中间腾出空隙来，让我坐下。看守锁门走后，他们才小声和我交谈，我才知其中有两人是通化中学教师，一名是逃兵，躺着的是安东的秦有德。他俩和秦有德都已经过一次或两次审问。秦有德醒来后和我谈起，我才知道安东支行经理淳于喜亮也被难。

据通化两位教师说，通化中学有一位日系副校长，曾为此事和当地宪兵队做过激烈辩解，随后他又印发传单，说明被捕26名校长、教师们无罪，但被遣送回国。

监室里的情况实在令人望而生畏。全室约有7尺见方，后墙高处有2尺长、1尺宽的扁窗，正面是碗口粗的密木栅，栅下面的一角是加重锁的小门，其余两面是通屋顶的高墙，地下角放一个无盖铁便桶。

典狱长是日本人，临时问案的法官也是日本人，其余是中国人，其中有一名准尉看守长，两名上士和一些中、下士。在监里，威风凛凛、杀气十足的是看守班长们。我第一次体验到周亚夫所说的：“将百万兵的大帅，也不及小小狱吏的威风。”这真是“见狱吏，头拱地，口欲言，而心胆惧！”

几天过后，由庄河送来13人，岫岩9人，其中，孤山学校校长收入我同屋里。

监狱生活是绝对受限制的，每人发一套薄被褥，早起要卷得整整齐齐。两顿饭，平时是高粱米。偶尔有一顿小糙子粥。早吃稀饭、咸菜，晚吃干饭、菜汤。早6时起床，十几分钟后放风和大小便，按规定是15分钟，但看守们往往提前收风。必须快走快便，时间略长，非打即骂。收监后，点名、坐候。监内跳

蚤、虱子多得无法清除，只有放风时到院内抖掉一些。

不定期的放风，到院子里走圈子，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是一次虐政。被难者无裤带，脚拖重镣，在短短的15分钟后，每人都是精疲力竭，喘息不堪。

几天过后，审讯开始，法官是日本人，翻译是中国人。第一次审讯，问过姓名、年龄后，问我：“你有哪些反叛行为？”答：“我什么反叛事也没做过。”第二次又问，“你对你的事情有什么要解释的？”我说：“我是满洲中央银行里的一名忠实的行员，我忠于我的支行经理职务，绝不是满洲国的叛徒。宪兵队不顾事实，强加给我罪名，我认为在法律上是不会生效的，请法官细察，免我受冤。”翻译完后，令我回监，以后再没审问。

记得农历二月初一这天，宽甸、岫岩、庄河的被捕者同日宣判。丛树春、栾继先被枪决，吴凤宸、杨春华判13年4个月徒刑，其余8人我们都是5年徒刑，缓期执行，被放出狱。这种缓刑是无限期的，因此，我出狱返回营口故乡时，仍受当地警察的刁难。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三辑）

桓仁教育界惨案真相

肖玉琛

1935年秋我从陆军训练学校陆大专科班毕业以后，回警备司令部任原职。这时于芷山已调任伪满军政部大臣，由于聚激接任奉天省警备司令官。1936年，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奉天省警备司令部改编为第一军管区司令部，由中将王静修任司

令官。同年12月，我被晋升为司令部中校作战科长。

“七·七”事变的前夕，为了巩固侵华大后方，日军一方面运用全部日伪军事力量“扫荡”抗日游击队；一方面残酷镇压所谓“善于煽动”的知识阶层。恒仁教育界惨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36年冬，驻今辽宁省恒仁县的日本宪兵队，突然逮捕了恒仁县尖山子小学张校长等20多名爱国知识分子，押到宪兵队监禁后，施以各种酷刑，强迫他们承认参加了以张校长为首的“抗日救国会”，并编造一份假案情，勒令被捕者照假案情招供画押，谁要不肯承认，就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剥筋押条、针刺指尖……整整拷问了半年之久，有的眼睛被打瞎了，有的胳膊和腿骨被打断了。不少知识分子被折磨成了残废，最后被迫在日本宪兵队编造的所谓“反满抗日供词”上签字画押。

日本法西斯为了进一步扩大镇压知识阶层的舆论需要，于1937年5月，将屈打成招的恒仁县20名知识分子送交伪第一军管区军法处进行军法审讯。会审组织规定，除军事法官外，必须有本科军官参加。我和军械处中校处员刘秉岩被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指令参加这次所谓的“军法会审”。

会审的组成人员是：审判长王冠英（军法处长）；审判官三浦（日本法官）；陪审官刘秉岩、肖玉琛（本科军官）；检查长小泽（日本法官）、姚法官；翻译、书记官各一人。

军法会审是1937年5月进行的。法庭设在第一军管区驻地——旧军阀张作霖元帅府东厢房军法处的一所大庭内。这天早上7点半，参加会审的成员按照指定的位置进入法庭就座后，由执法士兵把戴着手铐脚镣的20名“犯人”带入法庭。这些所谓“犯人”个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有的断肢折臂，有的眼球暴露，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刀光剑影的审

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遍体鳞伤的“犯人”……心里暗想：这是法庭，还是地狱？

审讯是在8点开始的。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尖山子小学张校长。当姚检察官问过他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后，要求他本人呈述“罪行”。张校长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抓住围栏，挺直腰杆，义愤填膺地说：

“在座的各位法官，请看看我们这些缺腿少胳膊的所谓‘犯人’，你们就会明白，宪兵队送交你们那些‘供词’是怎么得来的。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整整6个月的严刑审问，仅我个人就先后被打昏过3次，直到把我一条腿打断，一只眼睛打瞎……请诸位看看，现在我的腿还在淌着鲜血呢！难道这样屈打成招的供词，你们也相信吗？”

“住口！”姚检察官拍了一下镇堂木，喊道：“照这样说，难道是宪兵队编造假案不成？”

“检察官先生，”张校长毫无惧色地问：“法律是不是尊重事实？宪兵队说我去年9月在山林中开会的那一天，我正在桓仁县参加教育局召开的各小学校长会议，我还在会上作了教学汇报。既有人证在，又有文件在，可是宪兵队硬说那一天我在山林中召开‘反满抗日’的救国会议……请问检察官，难道一个人能分成两半吗？”

“可是你已经在供词上画押了。”姚检察官指桌上的供词说。“这上边难道是别人按的指纹吗？”

“是我按的指纹不假。”张校长吃力地移动了一下身子：“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这只被打瞎了的眼睛和这条被打断了的腿吗？”张校长把衣服扯开说：“你们再看看我这一身伤痕……”

参加会审的官员们听完张校长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申诉，个个面面相觑无言对答。这使所有“犯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争

先恐后地控诉宪兵队严刑逼供的罪行：

“宪兵队硬让我们承认参加了张校长召开的救国会……”

“不承认，就给我们用大刑……”

“你们看我的胳膊……”

“你们看我的眼睛……”

“……”

“犯人”的叫屈声和脚镣手铐的碰击声混成一片，法庭秩序顿时乱了起来。检察官把镇堂木拍得“叭叭”直响，也没有能够镇住“犯人”的愤慨情绪。直到审判长答应重新讯问，法庭才慢慢地静下来。

通过讯问，几乎所有“犯人”都推翻了原来的供词，一致要求重新调查此案。姚检察官用了半天时间一一进行答辩，并指示书记官做了详细记录，然后宣布说：“虽然今天犯人的供词与原来宪兵队提交的供词完全相反，但检察官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因宪兵队提交的供词，犯人已签字画押，既有人证，又有物证，因此本庭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起诉……”这时法庭又哄了起来。日本法官小泽一看形势发展下去，不但会导致推翻宪兵队用了半年时间严刑审讯得来不易的全部供词，而且将严重影响宪兵队的威望和日本帝国的形象。他凶相毕露地拿起镇堂木用力一拍，厉声喝道：

“这么说，你们无罪，宪兵队有罪，对不对？真是岂有此理！已经画押的供词翻案的不行！”

接着宣布休庭。所有“犯人”被20多名执法兵押回监狱。

午后1点多，会审员被召集到军法处办公室，商讨起诉和审判事宜，审判长王冠英首先发言，他说：

“大家都听到了犯人的申诉，有什么想法，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的意见嘛。”

上午审讯的悲惨景象历历在目，每个在座的中国人都心里明白：这里除了日本人的强权自由外，哪里还有中国人的法律平等。大家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日本人看中国人说什么，而中国人又不知道这些日本法官的真正用心。由于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从而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像一个衡量良心的天平，摆在我的面前，引起我多次感情冲动，想说几句公道话。但一想到宪兵队，一想到上午那些断腿、折臂的“犯人”，我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看这样吧……”日本法官三浦终于开口了：“大家知道，这个案件不是我们检举审讯的，而是日本宪兵队送交过来的，而且日本宪兵司令部对审理此案已作了明确指示，我们无权重新检察和重新审判，因为宪兵队送来的审判材料手续十分完备，我们用不着再去研究它了。”

这次会议就在所谓“自由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结束了。

第二天按时开庭。检察长小泽在审讯中凶相毕露地逼着每个“犯人”承认原来的供词。尽管一些“犯人”坚持说原来的供词是日本宪兵队严刑逼供，要求重新审理，但这位日本检察官竟置若罔闻地重复了一下由日本宪兵队提交的供词，就宣布“审讯完毕”，除两人免于起诉外，其余“犯人”仍按原来的供词起诉审理——20多名“犯人”只用了3个小时的所谓“审讯”，就匆匆休庭。

第三天早8点，审判继续进行。日本法官三浦拿着日本宪兵队判决原稿，对被判刑的人按所谓“法律条文”论罪定刑。尖山子小学的张校长、教导主任和一个姓王的“3名主犯”，以“设立抗日救国会、捐款支援抗日救国军、驱使会员扒铁路、切电线、窝藏共匪……”等“颠覆国家罪”，判处死刑。除一名60岁的老人、一名16岁的少年和被捕前就已残废的3名“犯人”宣

布无罪释放外，其余18名“犯人”分别判无期徒刑到3年以上徒刑不等。

审判结束后，在宣判前照例要开一次法官和陪审员参加的碰头会，对审判结果“是否合适”，进行扼要的研究。审判长王冠英一再要求对三浦法官作出的判决发表意见。

“肖科长说说吧？”

三浦法官笑眯眯地盯住我，不知是让我打开僵局，还是有意试探。这使我感到非常作难。在法庭上几次想说而没有敢说的一点想法，又开始在我的脑子里蠕动起来……我试探地说：

“我是第一次做陪审员，法律知识又很浅薄，不过我认为桓仁教育界案件是由桓仁日本宪兵队慎重检举，由姚法官起诉，三浦法官判决，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我无异议，不过有一点……”

我小心翼翼地说：“尖山子小学校长提出的他开会的地点和内容的确有出入，是否应该重新查实一下……”

“哦……”三浦法官点点头说：“肖科长提得很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曾到宪兵队查过。但宪兵队长说：‘这个案件经过半年才落实，上边催得很紧，不能再更改。审判也需要按原计划处理。’情况就是这样……按理我不该向大家讲，既然肖科长提到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理解就是了。”

“对，情况就是这样……”我后悔多此一举。

这天下午开庭，由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他先宣读无罪释放的3人，然后按照判刑少到判刑多的次序进行宣读，最后宣读判处死刑的3人名字，并宣布立即执行。这时由典狱长开始执法。我们在一片混乱和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匆匆退堂。

法院门口有三辆大卡车停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执法队将判死刑的张校长3人推上汽车，驶往沈阳城南浑河沿执行枪决。据

说张校长临刑前曾振臂高呼：“赶走日本强盗，还我锦绣山河！”

前两年，我曾在一个偶然的会见到了当年住在桓仁县的佟光同志。解放后，佟光同志来鸡西工作，任鸡西矿业学院的日语教师。佟光同志告诉我，他的一位亲属也在那次事件中被鬼子无辜杀害了。他说，当时受牵连的远不止二三十人，而是上百人。安东省的教育厅孙厅长就是死于此案。佟光老师也认为：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华，扼杀进步舆论，蓄意制造的一次镇压知识分子的血腥惨案。

（摘自《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1986年版）

父亲的殉难经过

左良知

我父亲左秀海，东北大学毕业后任凤城县职业中学校长兼农业实习所所长。在职期间，适逢“九·一八”事变，在这民族危亡关头，为挽救东北三省沦陷国土，他组织与领导了凤城县抗日救国会，任会长。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中，又被教育界拥戴为凤城县教育会（工会）会长。

抗日救国会，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众团体，在凤城县是以教育界为主，联合各阶层人民建立的反满抗日组织。它和东三省各地人民一样，不顾南京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举起反抗大旗，与各地义勇军武装一起，从不同角度向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浴血的救国救民斗争。

在漫长的十四年的艰苦岁月里，虽然敌强我弱，但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在斗争中牺牲的中华儿女何止千万，我父

亲仅是这个行列中的一个，现就他不幸被捕与殉难经过，据我所知追述如下：

不幸被捕

我父亲是1936年旧历腊月二十三日，被安东日本宪兵队去到凤城职业中学逮捕的。那天早上8点多钟，天气很冷。我父亲冒着严寒领着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做朝会、念“诏书”。那天早晨正当凤城职业中学在奉行这种当时视为至高无上的公事时，突然凤城警察署的大金、二金两个翻译，领着两个安东的日本宪兵闯进了学校。这帮家伙一到学校办公室，见我父亲不在屋里，便急不可待地马上逼着校工小高（名平阁）到操场上喊左校长。小高搞不清他们突如其来真正目的，因而叫他们坐等片刻，以俟校长下朝会再说。可敌人硬是不肯，逼着小高立刻去喊。小高拗不过，只好无可奈何地向操场方向走去。这时敌人紧紧跟在小高身后。

敌人这种不可一世的汹汹来势，已被念诏书的父亲瞧见了。只见小高快步紧走地到校长跟前报告说：安东日本宪兵队请您去开会。我父亲看出诡计多端的日本宪兵不怀好意，为了应付眼前突变的事态，不给广大师生造成恐慌气氛，他大声对小高说：“既然宪兵队请我去开会，也不是急三火四的事，可以叫他们到办公室坐等一会儿，我这里不是正在念诏书吗？怎么能随便中止停下来呢？”这些话显然是给敌人听的。

我父亲的话音刚落，敌人已齐刷刷地围在讲台跟前。其中一个宪兵，朝我父亲叽哩哇啦地吼叫了一阵，意思是说，他们奉上级命令，专请左校长到宪兵队开会议事，马上跟着走，迟误一刻也不行。我父亲看敌人那副骄横霸道的样子，汕笑着说：“哪有像你们这样剑拔弩张的请人开会的呢？我现在念诏书，这

是皇帝颁发的，谁敢阻拦？”那时，念诏书是所谓相当严肃的事，连皇帝本人也不敢贸然干预，何况一个小兵呢？但日本宪兵从翻译那里听明白之后，瞪圆两眼说：“什么诏书不诏书，通通不要了。”这样一来，敌人的狼子野心便暴露无遗了：开会假、抓人真。与会的全校师生立刻明白了：他们敬爱的校长，将要落到敌人的毒手里了。

父亲并未因猝不及防的事件而举止失措。他一本爱国者的大无畏风度，沉着而镇静地走下讲台，他对敌人不屑一顾，气宇轩昂地对小高说：“你到办公室把我的礼帽取来！”便昂首阔步地走到敌人前边，直往校门走去。敌人跟在后面，把父亲押走了。

中午时分，心地纯朴善良的小高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跑到我家报信，他怕不幸的消息惊坏了我母亲，说话吞吞吐吐，母亲发觉小高说话神色有异，约摸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她叫小高直说快讲，不要拐弯抹角。于是，小高便把早晨日本宪兵怎么抓人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临了，小高还神情紧张地叫我母亲赶紧打听打听。母亲骤闻之下，久久地怔在那里。但一贯刚强惯了性格，使她猛然清醒过来，果断地对小高说：“你快去招呼那些和校长常来往的朋友，让他们避避风头。”其实，敌人已在凤城教育界、工商界开始抓人了，这便是震惊省内外的“安东教育事件”。不仅在凤城，那时，安东各县也都进行了大逮捕，到处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傍晚，母亲从一位在火车站剪票的铁路工人那里得知，日本宪兵用手铐把我父亲押上去安东的火车。她回家后，沉痛而感慨地对我说：“自从秋后你父亲与通化师范佟校长失去联系，便知道时局紧张，但没有想到日本鬼子下手这么早。早知如此，让你父亲到北边打游击就好了（佟校长也是东北大学毕业的，与

父亲同学，是通化救国会的，也是这年冬天被捕的)。父亲被捕后，母亲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全力以赴想法营救父亲。

约在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有一位李教师从监狱里放出来。给我家捎来一串钥匙和我父亲身边的一些零用钱。他说，左校长叫家里把校内东西急速取回，别叫敌人得去。同时告诉家里，他的案情十分严重，是有去无还的。李教师说，左校长在宪兵队刑讯时，一点口供都没有，反而厉色指责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他比别人更加危险。听说，明后天，安东宪兵队要把他解送奉天（今沈阳）日本军法处了。母亲听后，失声大哭起来。

后据同监难友安东县五区小学校长刘景芳老人回忆时说：“他（指我父亲）在日本宪兵队审问时，挺刑不屈，死不承认，使日人无可奈何。”从父亲在狱中捎出的信来看，他始终坚贞不屈，对敌人抱着势不两立的态度。他对母亲写道：“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他确实是位坚决的抗日分子。

英勇就义

我父亲是1937年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与凤城县抗日救国会的6位战友，被奉天日本陆军军事法庭以颠覆罪非法宣判死刑的，同日午后枪杀在奉天的浑河沿。

父亲殉难那天，敌人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最后向祖国告别的时刻，依然豪情满怀，大义凛然地在刑车上振臂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见此情景，慌了手脚，立即把刑车掉过头来，又开回监狱，把嘴里堵上棉花，戴上手铐脚镣，眼睛蒙上黑布，才又押往刑场。

罪恶的枪声响了。敬爱的父亲和抗日救国会的其他6位战友都倒在血泊之中。

我和母亲痛不欲生地冲向前去。母亲在父亲身旁晕了过去。我一头扑在父亲身上，掏出他嘴里的棉花团，解下蒙在眼睛上的破布条子，父亲那双瘦骨下陷的眼睛，仍然怒睁不闭。这是死不瞑目的啊！我用手把父亲眼睛合拢起来。连声叫喊：“啊！天啊！爸爸看看我们吧！”尽管我破嗓呼喊，也拉不起倒在血泊中的父亲了。此时此刻，我再也听不到唤儿呼女的慈父之声了，只有那鲜红的血还从头颅中直往外涌，忠于国事民族的父亲的死，比泰山还重！当我给父亲脱换衣服时，他那双温热的手，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叫我感到温暖，但我父亲再也不能领我上学去了。眼前的国恨家仇，寡母孤儿怎能不叫人胆肝碎裂，痛哭欲绝呢？

父亲的灵柩运回凤城后，母亲带我在门前设起灵棚。母亲说，父亲是为国为民而死，死得壮烈。所以，不顾敌人的刁难阻拦，公开吊唁发丧。我跪在灵前烧纸安灵，亲友邻里相继而来。我记得有一位叔叔在我父亲出殡那天早上，在灵前拈香致悼词说：“秀海！您是民族之光。愿您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常青。”凤城职业中学的学生，在出殡前一天晚上，络绎不绝地来到灵前哀悼，他们为失去好校长而沉痛流泪，有的亲自烧纸祭奠，情景十分感人。

敌人是非常狡猾恶毒的。他们一面用公开的残杀手段镇压，另一方面又暗下毒手，宣判凤城县清真小学于松涛主任和凤城县文庙小学关子荣主任无罪释放。但在临释放前，给他俩注射了慢性毒针。我父亲曾在牢房里向这两位难友嘱托过，让我母女捎个口信，于松涛主任放回后即捎信给我们，由于我们忙于料理丧事去迟了，于已因毒针发作而身亡。幸亏关子荣主任身体好抗力强和及时抢救，他把我父亲的遗言转告给了我们。父亲叫我们在他死后到临江县十八盘岭下一家小店，找一位姓李

的交通员，那里的抗联义勇军会安排我们的。虽然我们母女后来没有去成，但那里的抗联在杨靖宇司令率领下，十分活跃。就像我父亲在信中说的：“尚有为的，一定会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

虽然事隔多年，但悲壮慷慨的往事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永远以前辈老人的抗日斗志，作为我振兴中华的动力，继承父辈的精神，使其发扬光大。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三辑）

邓士仁酷刑架上就义

邢佐和

邓士仁字之杰，铁岭大甸村人，奉天两级师范毕业，曾任铁岭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十余年，后兼铁岭县教育会长。在“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占领铁岭，因邓素孚众望，被士绅推荐为铁岭县教育局局长。1933年，调安东县任教育局长。

邓士仁对学生经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逢“五·九”国耻、“五卅”惨案纪念，都亲自讲话，教育学生发愤图强，以雪近百年来奇耻大辱。他在担任铁岭县教育局长时，办公桌上放一本字帖，我问：“邓老师还练字吗？”他说：“我喜欢读帖，懒于动笔。”我细看，是《正气歌》，遂知其醉翁之意，深服其爱国之志。我在铁岭女师任教时，他常常教育我“不要把学生教糊涂了”，“现在认真教好学生，用在将来”。可见他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他转职安东县教育局长后，积极参加救国会的各项爱国活动。他常说：“中国人要好好给中国人

办事。”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镇压人民爱国行动。8月的一天，邓下班回家对他夫人胡云程说：“日本宪兵在桓仁县大肆逮捕教育界人士，不少人被酷刑折磨死了，有的喂狼狗，有的被扔进浑江。”胡问：“为何被残害？”邓说：“不必问了！”这天，邓的情绪很不好。晚上，邓整理书橱书籍，拣出一堆字纸、书信，塞进炉子烧了，就在这时，他已经被盯梢了。

11月12日凌晨3点，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有几十人团团围住邓的住宅，凶神恶煞似地闯入室内，枪口直逼邓的胸口，并大肆翻箱倒柜，片纸只字都不放过。从3点搜到6点，一无所获，便把他绑走了。邓士仁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从容不迫，处之泰然，临走时对胡云程说：“不必为我担忧，要好好照看孩子！”据悉：与此同时被捕的有，安东商会会长孙朗轩、安东县教育会会长于礼亭、安东省教育厅钟股长、镇江山小学校长张镇藩、安东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等人。

就在邓士仁被捕的当天晚上5点钟，一个日本宪兵到他家问：“邓局长哪去啦？”胡云程答：“被宪兵队抓去了。”那个宪兵说：“回来了，大概一会儿就到家。”言罢，贼眉鼠眼地溜走了。第二天早晨，又来一个宪兵，说是“邓局长要转到奉天陆军监狱去，怕冷，托我来取皮袄。”胡云程说：“一会我亲自送去。”胡借送皮袄的机会来到日本宪兵队，宪兵说：“邓的，跑啦跑啦的有。”胡说：“在这里哪能跑呢？”宪兵说：“那，你到警察厅看看。”于是胡又去警察厅。警察厅说没有，又到日本大衙门（日本警察署），大衙门也没有，真是没办法，只好悻悻而返。时已日落西山了。第三天早晨，又来了一个宪兵，问：“邓局长没回来？”胡未答。晚上，又先后来了两个人，也都是同样的话，并说：“邓局长回来，到宪兵队自首，罪可减轻，若不，

罪上加罪。”

正在日本宪兵表演丑剧时，胡云程从一个内幕人那里得知：邓士仁被捕当天就开始刑讯，先用胶皮鞭打，接着灌凉水，随后灌煤油。打得他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昏厥数次，可是他却闭目不语。宪兵队长气急败坏，遂把邓悬空吊起来，可怜这位无辜者受到残酷折磨，这样一吊竟与世长辞了。等到暴徒再审时，发现邓士仁死了，就将其尸体送到连山喂狼狗了。于是，他们立即派人四处放风，说是邓士仁逃跑了。

与邓士仁同时被捕的人，同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者，不知有多少。亡国之恨，何其有极。我和邓士仁志士，有师生关系，对他的无辜被害，含冤饮恨，不忍其湮没，谨录之。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刘国安被害祸及全家

刘毓芹口述 沧石整理

被捕和探监

我的丈夫刘国安，铁岭县人，幼时家贫，刻苦读书，关心国家大事。在铁岭师范读书时，他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向同学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曾被当局拘留两天。1925年“五卅惨案”，刘国安率领同学起来罢课，并游行示威。1926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小学任教，经常作爱国宣传。“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入哈尔滨市，刘国安和他的同学白培辛持枪偷袭日军，各击毙日军一人然后潜回铁岭。刘先

后在抚顺中学和铁岭中学任教。1932年8月随铁岭县教育局长邓士仁，转到安东任县教育局学务股长。因参加安东抗日救国会，于1936年11月13日下午4时，在工作岗位上被捕。这个可怕的消息传来，我立刻昏厥在地，70多岁的公婆，幼小的儿女，惶恐万状，哭作一团，全家彻夜未眠。第二天我抱着两岁的小孩，来到安东日本宪兵队，站岗的宪兵，狰狞凶相，令人可怕。我问：“刘国安在这？”他找出一个翻译对我说：“在这里。”我的心算落了底。因为听人家传说，抓去的人要喂狼狗的。接着我说：“我要看一看。”回答说：“不准看。”第二天我带着衣服抱着孩子又到宪兵队，想借送衣服的机会与刘国安见一面，结果是衣服留下了，不准见面。我多方设法，托人弯转，终是徒劳，得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非法的判决

1937年2月安东日本宪兵队把这些事被捕的爱国志士，移送到伪奉天陆军监狱。这时正是天寒地冻的腊月，监狱的牢房中很冷，被难者吃不饱、穿不暖，又冻又饿，再加上酷刑拷问，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并没有逼出半句口供。后来除个别人宣布无罪释放外，绝大部分被诬为“反满抗日”，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20年、15年有期徒刑。我的丈夫刘国安等11名爱国志士就是在这次被杀害的。

诀 别

当我知道安东日本宪兵把这批爱国志士移送到伪奉天陆军监狱时，我带着孩子从安东赶到沈阳，恰好遇着同时被难的孙文敷厅长的小随从（忘记姓名），他领我到监狱看守的家里，看守说：“你来得正好，明天就是孙文敷、刘国安等11人处决的日

子。”这话如晴天霹雳，使我怔忡万状，这个小随从提醒我，我马上拿出5元钱，交给这个看守，恳切地托他代买几个烧饼送给刘国安，让他在临终前吃个饱，尽到我们夫妻最后一点情意。在监的刘国安，知道了我来探监，可以想像这是他在绝望中的最大安慰，在他生命仅存的一刹那，乘机在药口袋上写了一个遗嘱，由看守转给了我。上写：

“毓芹：我未死于病，而死于国事，已是幸运，亲老子幼，累卿一人。教子成人，重整门庭，迁徙农村，暂谋生活。安拜。”

我当时勉强抑制悲恸，也用纸条写了两句，来安慰将要永诀的丈夫，上写：“我永远忠于你的意志，决不动摇，服侍二老，教养子女，请君放心。”又恳求看守送进去，看守出来告诉我：“刘国安说：‘见字知心，死无遗憾。’”这是刘国安被捕后两个多月时间我与他的唯一通讯。

志士慷慨就义

第二天（阴历腊月二十七日）我抱着孩子来到监狱门前等候。精神异常紧张，四肢颤抖，牙关作响，盼望着在他临终前我能见他一面。这时从监狱里出来一名特务，我问：“这回有刘国安吗？”特务反逼问：“你听谁说的？你听谁说的？”从中午等到下午3时，才从监狱里出来两辆刑车，“犯人”坐在车箱中间。周围是宪兵和特务，手持明晃晃的刺刀，开往浑河北刑场。这11名爱国志士，都有高度的民族气节，视死如归。有的高呼：“中华民族万岁！”然后慷慨就义。

我急忙赶到刑场，准备收尸，但行刑已毕，尸体已不见了。只见雪地上血迹斑斑，十分凄惨，我不禁泪水满面。

难过的年关

我悲切地赶回安东。无法掩盖事实，只好向公婆说明，安慰老人说：“我养老送终，决不两样。”腊月二十九这天，安东警察署召集被难者家属，告知案件的处理，并催促在来年的正月初四日，到沈阳的关岳庙领尸。我们在安东，本来就无亲无故，在警特的监视下，谁敢同情我们，生活的来源断绝。手中原有的钱，去沈阳已花光了，年关在即，连挑水的工钱也付不出来了。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在这火起火落的困窘处境下，全家老小都患火眼病。正是漏屋逢雨，祸结灾连，这个年关是怎么度过的可想而知了。

过了年，阴历正月初四日，变卖衣物做路费与王宝璋的妻子阎素芳赶到沈阳，在阎书刚（阎素芳的弟弟）的帮助下，买了寿衣和棺材，来到关岳庙。陆军监狱的管理人刘某，同情我们，给了很大方便，把刘国安尸体的血衣脱下来，擦净尸体，穿上寿衣成殓。即将刘国安、王宝璋的灵柩，一起雇车送到铁岭马莲沟和大汎河分别埋葬。

迁回铁岭后的苦难

阴历正月十五日又变卖了东西家具，作为路费，我们全家迁回铁岭。生活稍微安定，但我的精神失常了，亲友看我有老有小，若有意外，谁来照顾这一家人呢！便一面劝解，一面给找工作。1937年3月，我到铁岭龙首山小学代课。地方上的警察特务经常盯梢，学校不堪其骚扰，半年后离职。又经同仁帮助到距城30公里的阿吉堡子小学任教。这个偏僻地方，可以少些麻烦。但是因为应酬不周被调转更远更偏僻的杨相国屯小学。于是，一家老小又搬到这个小村，租了一铺北炕。3个大人3个

小孩挤在这小炕上。天气寒冷衣服单薄，老人孩子冻得不敢出屋活动，只靠我一个人挣扎。到第二年暑假我不得不托人情，才得调到大汛河小学（距县城15公里），恰好落脚在共患难的王大嫂阎素芳家里，她的16岁儿子听父亲被捕被害，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只剩下王大嫂孤单一人，这时她的精神也不正常，我们在一起生活，互相照应，可以说相依为命。可是警特死死地盯着我们不放，可怜我们成为不可饶恕的罪人，每天提心吊胆。好不容易盼到抗日胜利，不料想蒋介石派兵进入东北，弄得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人民活不下去了。两位老人由于朝夕思念儿子，看到疮痍满目的情景，发愁上火，以致公公耳聋声哑，婆婆双目失明。1947年冬，缺柴无粮，两位老人相继故去，孩子们也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只剩一个男孩总算活过来了。

老人死后，我也迁到沈阳。经朋友介绍，在沈阳市立师范做女生管理员，孩子也上了学。这时的沈阳市，粮价一日三涨，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饥寒交迫，已进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幸而沈阳解放，不然早已转乎沟壑矣。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单荣道遭惨杀并株连其子

单熙明

我的父亲单荣道生于189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奉天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被聘为安东县立小学教员，不久，升为安东县立第三小学校长。他为办学事业竭尽忠诚，经过10年精心筹划，将原来几间茅草平房的学校，建设成一座砖瓦楼房，成

为安东县立第一流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安东沦陷于敌。

在这国土沦亡，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际，爱国志士，奋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安东、凤城、庄河、桓仁等县的民众救国会，相继成立。

安东民众救国会组织起来以后，行动机密，成绩很好。会员每次开薪，由工薪中扣除部分，作为捐款，就这样月复一月的将所筹集的捐款，汇总送往东北民众救国会。

1936年秋汉奸盖洪洲出卖了桓仁救国会，会员被逮捕，组织遭破坏，接着汉奸李大华、杨慕平也出卖了安东等地区的救国会。于是安东、凤城、庄河、岫岩等地的组织也陆续遭破坏。会员全被逮捕，在教育界造成一片恐怖气氛。仅在安东一县受到株连而被捕者80余人，而这些被害者都是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如孙文敷、邓士仁、秦有德、孙朗轩、刘国安、单荣道、张镇藩等。

我父亲被捕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一群强盗深夜破门而入。一个特务问：“你叫单荣道吗？”父亲答：“是。”又说：“起来，穿好衣服，不许动。”接着就到处搜查，后又到学校进行搜查，最后把父亲带到汽车上押走了。

我家离张镇藩家不远，母亲心情悲愤地去张家打听消息，结果也是同一个时间发生了同样事件。同时还听说于里庭校长和迟疏久校长等人也都被捕了。

约一个星期，得到消息说是被押在日本宪兵队，母亲叫我送行李衣服，我背了行李到七道沟日本宪兵队，对门卫说明来意。站岗的日本兵横眉瞪眼，冷不防左右开弓，打了我一顿耳光，接着就照我小腿狠狠地踢了一脚，我被踢倒，日本兵举起

刺刀照着行李就是一刺刀，说：“开路开路！”我当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怎能受得了如此毒打，躺在地上，好半天才起来一瘸一拐地背着行李回家。母亲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难过地哭起来了。

又过了半个月，母亲又叫我送行李，我也想看看父亲。这次门卫没有打我，而是把行李收下了。两个月后又通知我家去取行李，可是所取回来的行李，还是我送去的那个原样，根本就沒给父亲使用。

事后听人说：我父亲等人被捕后，每天都受严刑拷打，用毒打、灌煤油等酷刑直折磨得我父亲七窍流血。逼问：“你是不是抗日救国会会员？”父亲回骂说：“你们是狗强盗！”日本宪兵就用烟头烧，直烧得他几次发昏，遍体鳞伤，接着又把两个大拇指吊起来飞打，日本宪兵仍然没有取得口供，最后又叫我父亲抱炭火盆，两手都烧焦了，最后的回答仍是“不知道”。爱国志士们受尽了酷刑，但无一人屈服。

敌人后来把我父亲与其他一些爱国志士转移奉天陆军监狱，继续审讯。

1937年2月5日最后一次审讯，我父亲等11人以“反满抗日”罪被判死刑，当他们被送到刑场处决时，志士们都大骂日本帝国主义狗强盗，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尔后慷慨就义！

父亲尸体运回乡里后，警察特务下令：不许烧纸，不许吹喇叭，不许念经，不许杀猪摆席，抬出埋葬完事。

父亲死后，我们自然是“反满抗日”的家属了，全家失去了自由，我是他的长子，更备受欺凌。

1937年我正在职业中学读三年级，受尽了日本教师的欺凌。上体育课时，日本教师以练武士道为名，拿我当靶子，拳打脚踢，打倒了站起来，还得立正。入凤城师范学校，在校期

间，上劳动课，日本教师叫我挑大粪浇西红柿，不小心浇在叶子上，强迫我朝着西红柿跪着，叫我把大粪吃了，我不吃，他就往我头上浇大粪。

1939年冬由凤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派到安东县村立小学当了3年教员。在这3年中，日本特务对我进行两次“身元调查”。1941年冬集训时，有一次因雪天迟到，日本教官当着教师面罚我跪，还拳打脚踢，进行人身污辱。

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弟、妹等搬回老家居住（安市郊）。我家处于洼地，有一次大雨成灾，洪水把我家房子冲垮，母亲带领弟、妹到别处躲灾，保长官明璋领着保丁，边赶边骂，你们是国事犯，反满抗日的罪人，不在自己家为什么还到处乱走，快回去！保丁押着母亲、弟、妹等回到被水冲倒的旧居，到残墙边，母亲一头就倒下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东北，我家才得翻身。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二辑）